

專訪 | 陳忠敏教授：漢語方言語音與歷史層次分析法

語言學冰室

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專訪學者：陳忠敏教授

日期：2017年1月19日（星期四）

時間：下午2點30分

地點：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學者介紹

陳忠敏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（UC Berkeley）語言學博士（2000），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，博導。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（2004-2011），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客座教授（Visiting Professor, 2007-2009）、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、南京大學兼職教授、上海大學“自強”兼職教授（2004-2007）、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- 研究院特聘研究員、上海市語文學會副會長、Li Fang-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執行編委、《中國語言學集刊》編輯委員會副主編、《語言研究集刊》主編。專業研究和教學方向：漢語方言學、歷史語言學、實驗語音學。

1、陳教授您好！您從聲母（從邪床禪母）的角度論證了吳語繼承了南朝江東方言的特徵，請問吳語的韻母如何體現江東方言的特點？

一個方言是否繼承了江東方言，要確定江東方言的特徵必須有人說過，顏之推就說過江東方言的聲母從邪不分、床禪不分。他也說過韻母魚虞有別，這方面我也做過（陳忠敏 2013）。

那麼，聲母和韻母之間的區別在哪裡呢？我認為，把一個漢語方言的聲母和韻母分成兩部分，總是聲母少，韻母多，這是肯定的。特別是閩語，只有十五個聲母，韻母就有九十幾個。一個語言裡，假設有二十個聲母，出現機會是二十分之一；韻母的話，假設有九十個韻母，出現機會是九十分之一。至於聲調，如果是四個或者是八個的話，那麼出現的機會就是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。出現的頻率愈高，特徵愈重要，所以我覺得聲母應該比韻母更重要。

要做江東方言與現代方言關係的研究，我認為要符合三個條件：

- 1) 古人必須說過
- 2) 聲母的重要性大於韻母，因為聲母出現的頻率高
- 3) 現代方言裡的江東方言特徵還在

關於第三點，所謂的“還在”就是說還可以看出江東方言的痕跡，有的方言裡已經沒有任何江東方言的痕跡了。經過一千多年的語言演變，和在一中心多層次的模式下，中原地區的權威官話對周邊語言產生巨大的影響，它的滲透力強得可以把江東方言的特徵“洗乾淨”。吳語還沒被“洗乾淨”，還有江東方言的痕跡在，把上面的層次（文讀層）剝離掉，下面（白讀層）還可以看出來是江東方言的東西。

2、以“類型”劃分方言區是學術界的主流，請問是甚麼觸發您提出應該以“演變”來劃分方言區？

以“類型”劃分方言最早是趙元任提出的。歷史比較法可以看出語言之間的親疏關係，但現在的漢語方言分區看不出來，所以“類型分區法”已經把這種特點丟棄了。我認為方言分區不僅僅要把方言分開來，還要說明它們的遠近關係，而這遠近關係必須要跟歷史演變的情況掛鉤。我們把方言分區不是為了分區而分區，而是為了看出歷史的演變和方言之間的關係是“親”還是“疏”，但是現在的分區法是看不出來的，所以我認為必須要恢復歷史比較法的傳統。

要照顧到東亞，特別是我們漢語的地區歷史演變特點，歷史比較法不完全適用，所以我們要根據東南亞及東亞語言演變的歷史背景，用層次分析的方式來彌補歷史比較法的不足。“東亞”包括了韓國、越南、日本等漢字文化圈內的地區。如日本有漢音、吳音兩層，我們漢字借過去，使其產生系統性的對應，韓國、越南也是這樣。兩千多年來，中原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地向四周擴散，以語言為載體把文化傳到東亞，這樣，語言的層次就出現了。越南語本來是沒聲調的，但由於長期受漢語的影響，跟漢語愈來愈近，產生了單音節和聲調。

3、您從事方言研究多年，請問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研究方言歷史層次的心得？

我大概在 1984 年當碩士生時開始做研究，調查了很多地方，愈來愈發現一個方言裡有很多其他的成分。以前課本學的結構主義是很“純潔”的，系統性很強，同義異

構是不可能產生的。一種語言裡邊如果指一種事物，要用兩種說法來說，這不是一種好的語言。按照結構主義來講，不可能有等義詞，因為根據經濟性原則，語言必須精簡。但是去調查活的語言的話，就會發現等義詞大量存在，這要想到到底是什麼道理。這是漢語一種獨特的現象，比方上海話“自行車”有兩種說法：“自行車”和“腳踏車”，兩者完全等義。這是漢語的發展歷史造成的——權威語言不停地同化周邊語言，所以我提出一句口號：“漢語方言官話化，少數民族語言漢語化”，兩千多年來，我們的語言都是這樣的。

看出調查的結果和從課本所學的有相矛盾的地方，我們要去觀察它的歷史人文背景，找出形成這種現象的機制。用這個方法去深入研究，會發現新的問題，然後提出新的考慮、新的說法、新的漢語演變史史觀。漢語史觀很重要，以前都是用高本漢的，所以一個新的漢語史觀必須提出來。

4、請問您對中國語言學界未來的發展有什麼期望？

以前李方桂先生說過以後的人才要“廣”，還要“精”。學習的時候知識結構必須很廣，但到了某一定的程度的時候，就必須要對一門東西“精”，“廣”是為“精”服務的，所以要妥善地、合理地把兩者的關係處理好，這是第一。比如說學語音的，必須學句法；學句法的，也必須學語音；學歷史句法的，也必須把現代句法學好，因為整個理論是現代句法再往上推，所以共時的和歷時的都要學。

還有就是要做一流的學問，必須緊緊地把握住語言學研究的方向、世界的潮流。我們必須要學一些理工科的東西，數據是一個大趨勢，統計學是必要的。比方說調查了五百個人，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意我的想法，那用數據就可以說明問題。還有，語言學說到底就是認知科學，因為語言是人類交際的工具，“聽得懂”就是一個認知的過程。這個認知過程當中，人腦怎樣處理語言是一個很重大的理論問題，所以現在世界語言學都往這個方向在走。這還是一個“顯學”的問題，語言學如果困在象牙塔，只是幾個人在裡面做，不管外面的事情，這樣語言學必定會死亡的。所以，必須要加入到腦科學，用科學的角度研究，我自己也在大量地做這方面的工作。有雄心、要做得好的話就必須往前走。

李方桂先生看得比較深遠，首先要“廣”，然後要“精”。但現在還不夠，要緊緊地把握語言學研究的方向，否則就會被邊緣化。這是一個共通的、全球化的時代，不能背道而馳，中國遲早要走世界語言學研究的共通道路，所以年輕人要學習新知識，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，這樣才能緊貼語言學發展的潮流。

參考文獻

陳忠敏。2013。《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採訪/整理：Bonny、此系

攝影：此系、風駿、Bonny

（轉載自2017年2月15日微信公眾號「語言學冰室」文章）